

Mistranslations of Subjectivity: The Textual Unconscious in Conrad's Work

By Daphna Erdinast-Vulcan

Translated by CHEN Fengjiao^{1,2} & LU Lijing²

¹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² Kwansai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Received: March 21, 2024

Accepted: April 2,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Daphna Erdinast-Vulcan, trans. CHEN Fengjiao & LU Lijing. (2024). Mistranslations of Subjectivity: The Textual Unconscious in Conrad's Work.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075–08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5>

Abstract: The article engages with Freud's "Mystic Writing Pad" (1925) as an interpretativ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reading the unconscious labour of the text in three of Conrad's novels. The distinctive commonality of these texts is the occurrence of a form of mistranslation, known in translation theory as "false cognates", or more colloquially, "false friends" or "faux amis". The readings offered in this context highlight aporetic moments in these novels, moments of undecidability, where the use of false cognates seems to cross the boundary-lines of narrative levels, and cannot be exclusively assigned to either the character, or the narrator, or the author. These aporetic moments are, I suggest, textual equivalents of the physical points of contact in Freud's model of the "mystic writing pad". The convergence of metalepsis with linguistic distortion in the narration indicates, in all three cases, a reverberation of unconscious anxiety about paternity and filiation and desire for a grounding of subjectivity, which boils over and across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text, challenging the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extual and the psychic, and generating a process of transference which implicates the reader as well.

Keywords: Conrad; Freud; "faux amis"; aporia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Études de lettres*, 2022 (318): 47–63.

Notes on the author: Daphna Erdinast-Vulca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Haifa, and the Editor-in-Chief of Haifa University Press. She is the author of *Graham Greene's Childless Fathers* (Macmillan, 1988), *Joseph Conrad and the Modern Temp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Strange Short Fiction of Joseph Conr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numerous articles on literary modernism and on the work of M. M. Bakhtin.

Notes on the translators: CHEN Fengjiao, Ph. 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andidate at Kwansai Gakuin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practice, email address 67898632@qq.com; LU Lijing, an MTI student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address lliestudy@163.com.

主體性的誤譯 ——康拉德作品中的文本潛意識

達芙娜·埃爾丁斯特-沃爾坎/文 陳鳳姣 盧麗晶/譯

摘要：本文以弗洛伊德的《神秘書寫板》(1925年)一文為解釋出發點，探討康拉德三部小說中的文本潛意識工作。這些文本的獨特共性在於出現了一種誤譯形式，在各翻譯理論中稱其為「假同源詞」，更通俗的稱呼則是「假朋友」，法語中的對應詞是 *faux amis*。在此語境下的解讀突顯了這些小說中的絕境，即不確定性時刻，因為假同源詞的使用似乎跨越敘事層面的界線，無法完全歸因於角色、敘述者或作者。本文認為，這些絕境在文本中相當於弗洛伊德的「神秘書寫板」模型中的物理接觸點。轉喻與語言扭曲在敘述中的融合表明：個體在潛意識層面上對父權與血緣關係感到不安，對建立自己的主體穩定性具有強烈的渴望，這在角色、敘述者和作者那裡都會有回響，這些不安和渴望超越文本的不同層次，挑戰文本與心理之間的本體論區分，產生一種也涉及讀者的移情過程。

關鍵詞：康拉德；弗洛伊德；《神秘書寫板》；絕境

來源：原文載於《文學研究》(*Études des Lettres*)，2022年，總第318期，47-63頁。

作者簡介：達芙娜·埃爾丁斯特-沃爾坎，海法大學英語教授，海法大學出版社主編。海法大學英語教授，海法大學出版社主編。

譯者簡介：陳鳳姣，浙江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關西學院大學在讀博士，主要研究興趣是非洲文學藝術、文化交流、翻譯教學與實踐，郵箱 67898632@qq.com；盧麗晶，浙江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MTI 在讀研究生，郵箱 lliestudy@163.com。

翻譯一直是精神分析理論中的一個富有生成力的概念：早有弗洛伊德對德文詞語「Übersetzung」的多義運用，用以指代多樣但相關的術語，如「翻譯」「轉喻」「隱喻」和「移情」，後有讓·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的無意識「待翻譯(*à traduire*)」概念，對精神分析進行重新構想和改革。該學者將精神分析視為一個「解譯—再譯」的過程。各翻譯理論則從各自的角度出發，主要是將潛意識這個概念作為翻譯者工作機制或翻譯文本分析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據稱，翻譯選擇有時會產生歧義或錯誤，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技術性的，而往往由翻譯者與源文本或其作者之間的潛意識關係產生。最全面的是，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 2002)引用讓-雅克·勒塞克勒(Jean-Jacques Lecercle, 1990)的「語言剩餘(*remainder*)」概念，並將其與翻譯的過程和產物聯繫起來。根據勒塞克勒(1990)的觀點，「語言剩餘」可被視為：「語言層面上的弗洛伊德式潛意識，被語法規則所排除或壓抑，卻試圖通過笑話、口誤、言辭錯誤和詩歌等形式再次顯現。」韋努蒂認為，這種能引導讀者注意「語言的絕對異質性」的語言效果，當它們「使單一所指的交流變得複雜」時



(Lawrence 2002: 219),在翻譯中就會變得明顯,並可能被歸因於譯者的潛意識動機。他認為,這些錯誤「可能表徵的是一種渴望,不是僅僅為了質疑,而是為了挑戰或抵制在外文文本中展開的話語」(Lawrence 2002: 232)。

儘管這些論述對跨語言翻譯的闡述有啟示,但對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語內翻譯,或者說目前只能不太精確地被稱為「自我誤譯」現象,它們的意義則更加複雜。雅克琳·阿馬蒂-梅勒(Jacqueline Amati-Mehler)與她的幾位合著者在《潛意識的巴別塔》(*The Babel of the Unconscious*, Amati-Mehler, Argentieri & Canestri, 1990)一書中舉了幾個例子,以期說明這種複雜情況——該書從精神分析層面研究雙語能力、多語能力和「多邏輯說」(polylogism),重點關注那些在多種語言中「形成潛意識的方式是相互結合的」個體(5)。通過在臨床和理論這兩個層面研究這一現象,這幾位作者得出以下結論:內部語言的「分裂」實際上可能對精神分析過程具有生產力,這一過程旨在「恢復話語的功能多元論,以言語多聲性來表達」(284),因為這最終能夠讓被否認、分裂和分散的真相得以浮現,並通過其他途徑「回到我們的身邊」(288)。我絕非局限於精神分析的範疇,認為文本潛意識工作可以開啟能使文學文本閱讀富有洞見的不同模式,但我們必須遵循索珊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的說法,即「需要研讀的對象是文本中總是會有的、無法被理解的內容」(Felman 1980: 141)。以下討論通過文學棱鏡(literary prism)把自我誤譯與潛意識機制間關係概念化,將弗洛伊德(1925)關於「神秘書寫板」的論文作為解釋模型,進而閱讀康拉德的三部小說。我認為,這些小說的顯著共性是一種自我翻譯或自我誤譯的形式,這可能會對文本「無意識工作」產生一些有益的見解。(Bellemin-Noël 1999: 225)

一、康拉德作品中的絕境

約瑟夫·康拉德的文學作品是研究自我誤譯的絕好文本。但是,在深入研究文本本身之前,應該先考慮一下康拉德與其寫作語言間關係的特殊性。毋庸置疑,無須在此提醒康拉德的語言域外性(extra-territoriality)——他使用一種與他的母語(他是波蘭人,母語是波蘭語,第二語言是法語)完全不同的語言,也無須提及他對自己英語熟練程度的敏感性。儘管他對批判性評論感到不滿,但他在被公認為英國文學傑出代表之後仍不願意被視為「一種怪胎,一個用英語寫作的令人驚訝的外國人」(Conrad 1988: 488)。然而,同年,康拉德寫信給瑪格麗特·波拉多夫斯卡(Marguerite Poradowska)稱:L'Anglais m'est toujours une langue étrangère(英語對我來說始終是一門外語)(1907: 401)。

鑑於自白者是一個當時已用英語創作出好幾部文學傑作的作家,我們不由得更加仔細地研究起康拉德與英語和法語之間的複雜關係,尤其是法語,對他的影響似乎更深刻、更直接。克洛德·梅松納(Claude Maisonnat)(2013)在其論文《康拉德文學中的法語》(「Le français dans l'écriture conradienne」)中深刻討論了這種關係——這篇論文通過人物、地點、對話、引用和互文借用詳細而富有啟發性地闡述了法語在康拉德小說中的無處不在,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散文中極其特殊的介質,主要表現為法國用語和偶爾的錯誤借譯」。梅松納對法語在康拉德作品中的作用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他認為作者的多語能力涉及自我翻譯過程,因為法語似乎是其英文書寫的基礎;儘管在當前的討論中尚無法充分展示這篇論文的全部內容,但還是有必要提一下梅松納的如下觀點:康拉德的英語受到了法語的「困擾」;「高盧主義」(gallicism,指從法語借

用並在英語中使用的單詞或短語)或「假朋友」普遍存在,這是兩種語言間關係的特徵:

康拉德的英語寫作中經常出現高盧主義,這一事實似乎證實了福特說過的一句話:康拉德確實是用法語思考的。這些表達方式並不總是被一些英語讀者所察覺,他們抱怨他的散文不符合維多利亞語言的標準。[……] 在使用英語時,即使是在寫作中,他也會陷入所有法國人學英語時遇到過的陷阱。他在經典的「假朋友」這一方面犯了初學者會犯的錯誤;最令人驚訝的是,雖然他居住在英國、使用英語已經三十多年,但他甚至在他的最後作品中也犯了這些錯誤(Maisonnat 2013: 9-15)。

梅松納後來寫過一篇主要關注康拉德的《流浪者》(*The Rover*)的論文,將康拉德使用高盧主義用語這一行為描述為他作品中的「秘密特工」,並指出:

康拉德的小說中高盧主義持續存在,一個最明顯的後果是它在兩個方面破壞了閱讀過程:首先,對於那些根本不懂法語的人來說,這會導致文本空白;其次,這使解釋難以順利進行,因為符號與所指在兩種語言中並不一定相同(Maisonnat 2016: 162)。

然而,當前的討論聚焦於不是那麼明顯出現的高盧主義用語,我認為:這些高盧主義用語充分表明了康拉德文本的關鍵之處存有根深蒂固的矛盾性;或者說,是如邁松納所稱的「保持沉默、但大多以缺席方式存在的」幽靈文本(2016: 165)。我認為,這種幽靈般存在的實例可以被解讀為我借用貝勒明(Bellemin)的說法所稱的「文本潛意識工作」的典型表現,因為這樣的例子無法明確地限制在敘事層次或超敘事層次之內,但似乎是對作者最個人的、最緊迫的焦慮做出的迴響。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論述的,康拉德的語言無根性和離開故土導致的敏感在其作品中轉化為一種形而上的思鄉病,對父權和血統的焦慮,以及對歸屬於比自身更大的集體的渴望。一種「內心的陌生感(strangeness within)」,即無論用任何一種語言都會有的不自在感,在康拉德作品中不僅僅體現在一個層面上,而且人們很可能將他對離奇現象的關注、經常出現在其作品中的「雙重形象」,以及他小說中的結構性缺陷視為「無法理解的內容」的例子。

然而,本討論關注的是一種特定類型的「絕境(aporetic moments)」,在康拉德作品中的一些「假朋友」(法語對應詞是 *faux amis*)實例中可以進行症候閱讀。為了澄清這個術語,這些翻譯錯誤發生在兩種語源相關的語言中,當兩個詞拼寫相似(是同形詞)和發音相似(是同音詞),從而被誤認為具有相同的詞源,並且具有相同的含義(例如,法語中的 *sympathique* 和英語中的 *sympathetic*)。正如查米佐·多明格斯(Chamizo Dominguez, 2007)所定義的,這是一種「特定的語言幹擾現象,指有些詞在兩種或更多的語言中在寫法和/或發音上相同或非常相似,但它們的含義可能截然不同,或有些不同。換言之,假朋友是那些形式相似但意義不同的詞語」(Dominguez 2007: 1)。以下討論聚焦於一些有趣的「部分語義假朋友」的例子,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乍一看它們並不特別令人困惑。只有當我們意識到此語境中使用的同源詞的含義實際上與文本明顯所示的方向相對立,翻譯錯誤才變得明顯。

如果「部分語義假朋友」的出現不能歸因於對目標語言的無知,那麼,正如韋努蒂所建議的那樣,它應該被解讀為潛意識動機(Venuti 2002)。我認為,下面三個絕境正是這種情況,它們與康拉德的流亡敏感性密



切相關。我在其他地方對他的這些小說做過詳細的解讀(參見 Erdinast-Vulcan 1995, 2003, 2004, 2006),在此我將著重探討它們的顯著共同點——部分語義「假朋友」的出現——這將使討論引到弗洛伊德的「神秘書寫板」解釋模型。

第一個案例是《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Conrad 1899)。馬洛經歷了沒完沒了的延誤——這些延誤很可能是對庫爾茨發動的陰謀的一部分,即將抵達旅程盡頭,終於要到達目的地,他設想與這位超級代理進行一次「公開談話」,打算告訴他來這個貿易站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但是,傳遞知識這一觀點似乎是不可能的:「My speech or my silence indeed any action of mine, would be a mere futility. What did it matter what anyone knew or ignored?」(我的談話或者我的沉默,說實在的,不管我採取任何行動,都不過是白費勁。一個人知道點兒什麼,或者不知道點兒什麼,又有什麼關係?)(Conrad 1899: 113;黃雨石譯 2002:115)

馬洛——準確地說是康拉德——在此處使用的動詞明顯是錯誤的。他說的這句話以 speech/silence(言談/沉默)這一組對立詞和連接詞「or」開頭,這就要求後面有一個由二分對立的動詞構成的平行結構:本應該是「What did it matter what anyone knew or didn't know.」但在此使用的動詞是「ignore」,顯然受到法語單詞「ignorant」的幹擾,因為英語中沒有一個動詞表示「not-knowing」(不知道)。英語中的名詞「ignorance」確實意為「沒知識」,但英語中的動詞「ignore」具有與其截然不同的含義,幾乎是法語單詞「ignorant」的反義詞。顯然,這是一個「假朋友」的例子。

我認為,這正是文本潛意識的出現。根據馬洛的語言失誤,可知他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他不知道暴行,而是他潛意識裡選擇忽視,因此他一直以來沒有回應他自始至終都知道的暴行,也沒有去證明。從言語與沉默間的界限被抹去到道德能動性和行動被放棄,只有一步之遙。「我的談話或者我的沉默,說實在的,不管我採取任何行動,都不過是白費勁。」如果我們考慮到框架故事(即這個敘事的背景)是老友重聚——這些人都是帝國計劃的一部分,或許就能理解為什麼馬洛無法說出在黑暗的非洲腹地獲取的知識。如果一個人想要找到歸屬感,成為共同主體的一部分,他必須拒絕去了解這個共同體的犯罪行為;也就是,要不予理會。也許,正是希望屬於一個超越自身的整體的需求、恢復自己的血緣和父權關係的需求也激發馬洛最後向庫爾茨的未婚妻說謊的動機。畢竟,這是以父親的名義撒的謊(參見 Erdinast-Vulcan 2003, 2004)。

第二個相關案例《吉姆爺》(*Lord Jim*) (Conrad 1900),敘述者仍然是馬洛,這位文學人物經常(而且相當合理地)被讀者視為康拉德本人的代理人。回憶一下,馬洛對吉姆而言是一個父親般的角色,吉姆是一艘商船上的年輕大副,他犯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在一艘載有數百名乘客的船隻將要沉沒時,他棄船逃生。這一行為不可原諒地破壞了行業團結得以建立的基石——「正直行為的神聖原動力」(50)。吉姆這位年輕人似乎是「我們中的一員」,他的懦弱行為讓馬洛深感痛苦,馬洛試圖將吉姆重新融入社會,重新連接起他作為(商船)船員訓練艦上的前軍官與吉姆之間父子般的關係。馬洛試圖為吉姆的懦弱找到某種「救贖理由」(50),在此過程中,他與各種角色打交道,這些人對「帕特納」號事件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從白力厄利(Brierly)船長無情的超人完美主義到徹斯特(Chester)的卑鄙憤世嫉俗。

在這個人性光譜的某處,在更接近白力厄利但絕對更有人性的地方,我們發現有一位法國中尉,一位年長的軍官,他在吉姆棄船逃生後接管了那艘船,用馬洛的話來說,「頂替了」吉姆(144),冒著生命危險,在舵輪旁邊站了三十個小時,直到「帕特納」號被拖上岸。這位法國中尉似乎承認並理解身處危機時普遍會有一些弱點,即恐懼、疲勞、無力。

人生下來就是個懦夫……但習慣——習慣——時勢的必需——你知道嗎？——以及怕別人瞧見——voilà。一個人因此也只好容忍下去，不露出驚慌的神情了。還有別人的榜樣，他們並不比你高明，但是面子上卻顯得很勇敢……。（Conrad 1900: 147；梁遇春、朱一葦譯 2018:136）

馬洛希望能從這個具有祭司風範的男人身上為這位年輕人（吉姆）爭取一些赦免，但最終判決並不盡人意。讓馬洛苦惱的是，這個本來可能理解並同情吉姆所處險境的人最終拒絕給予寬恕。他說，畢竟這是一個關乎榮譽的問題。不過，我們應該注意這段對話的前半部分，據我們了解，這段對話是用法語進行的，但為了方便馬洛的聽眾，我們將其譯成了英語，並在英語譯文之後用斜體將法語原文中的一些短語放在括號中：

His broad bosom heaved regularly while he went on telling me that it had been the very devil of a job, as doubtless (*sans doute*) I could figure to myself in my quality of a seaman (*en votre qualité de marin*). (Conrad 1900: 139)

他寬大的胸膛一下一下起落著，一面繼續告訴我那是件見鬼的麻煩勾當，像我這樣當海員的人 (*en votre qualité de marin*)，必定 (*sans doute*) 能夠體會出來。（Conrad 1900: 139；梁遇春、朱一葦譯 2008:128）

馬洛對最後一句的翻譯顯然又是一個「假同源詞」的例子：「*en votre qualité de marin*」被馬洛翻譯為「*in my quality of a seaman*」。法語單詞 *qualité* 和英語單詞 *quality* 無論是發音還是拼寫都很相似，具有誤導性，但法語單詞 *qualité* 在這個語境中應該被翻譯為 *capacity*，而不是 *quality*。

正如在《黑暗的心》中一樣，這種誤譯是有高度症狀性的。馬洛迫切想要確認那個他畢生力圖踐行的行為為標準——一個維繫共同體、海洋夥伴關係的標準，他將可能被承擔或拋棄、受環境和情況限制的海員的能力 (*capacity*)——角色、職能、工作——與某種本質的品格 (*quality*)——主體性的內在方面——混為一談。

我們可以在此回想一下這個敘事中的一個早期時刻，同樣的問題出現在馬洛與白力厄利的對話中：「『我想，你還說你自己是個海員。』他生氣地說道。我說我是這樣稱呼自己的，也希望我的確可以算做海員。』（58）吉姆對自己作為英雄的浪漫化想象完全以自我為中心，與其他入、團結或對任何超越個人的事物的承諾無關，而馬洛知道美德不是個體主體的內在品質；它融入於某種共同體主體性，「我們」，一種職業共同體，一個能夠驗證自我並為其提供道德支持和勇氣的集體。事實證明，這與吉姆的唯我主義英雄幻想並無二致。問題在於美德的內在性。那麼，問題在於美德的內在性——海員的能力何時變成了品格（如果它確實變了）？在面對吉姆的失敗時，父權的要求——船員共同體的「主權力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如果吉姆真的像馬洛所堅持的那樣是「我們中的一員」，那麼他棄船逃生這一行為象徵馬洛作為職業導師和父親形象的失敗（參見 Erdinast-Vulcan 2006）。

康拉德作品中的第三個案例，或許是最令人痛心的案例是《在西方的注視下》（*Under Western Eyes*, 1911）。拉祖莫夫（Razumov）在背叛霍爾丁（Haldin）之後，獨自一人在房間裡：



He got on his feet, and divesting himself of his cloak hung it on the peg, going through all the motions mechanically ... Turning away from the peg, he thought in that same lifeless manner that it must be very early yet; but when he looked at the watch on his table he saw both hands arrested at twelve o'clock ... The papers stabbed to the wall arrested his attention ... In his listless wanderings round about the table he caught sight of his own face in the looking-glass and that arrested him. The eyes which returned his stare were the most unhappy eyes he had ever seen (Conrad 1911: 69).

他站起身來,脫去鬥篷,把它掛在鉤子上,呆呆地做完所有這些動作。[……]。從掛衣鉤轉身走開,他以那種死氣沉沉的模樣想道,這會兒肯定還很早呢;可他注視著桌上那塊表,這時他卻看見兩根指針都停在十二點鐘[……]。戳在牆上的那張紙片引起他注意。[……]。在他百無聊賴地繞著桌子徘徊時,他在鏡子裏瞥見他自己那張臉,而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雙回應他注視的眼睛是他曾見過的最為憂鬱的眼睛(Conrad 1911: 69; 許志強譯 2015:70)。

在這段文字中,arrest 一詞顯然與法語中的動詞 arrêter 相同。但是,在英語中使用這個動詞需要注意搭配:手表的指針停了,應該用 stop,而不是 arrest;戳在牆上的那張紙片引起他注意。應該用 hold,而不是 arrest;鏡中看到自己的臉使他停了下來,應該說「make him pause」,而不是「arrest」。在這個案例中,英語中的意思表達仍然是足夠清楚的,因此我們不是將其與「語義上的假朋友」聯繫起來,而是像海德(Heid)和普林斯露(Prinsloo)一樣,將其視為「搭配性假朋友」的情況(Heid & Prinsloo 2008)。

我們應該記得,這一情節大約發生在霍爾丁被拉祖莫夫出賣給當局而被捕的時候。拉祖莫夫將自己視為理性、西化和自主的個體,認為其背叛行為是在拒絕他的斯拉夫「他者」,是在拒絕被捲入他所認為的這個他者的熱情而危險的無政府主義。然而,這個行為本應確保他的自身安全和獨立(或者他自己以為應是如此),卻只是將他與那個他者緊密相連。arrest 這個動詞在這個語境中的迴響令人痛苦地想到霍爾丁就在貌似獲得解放的那一刻所面臨的命運,並將拉祖莫夫變成了這個無法驅除的幽靈的替身或「宿主」。

二、轉喻和神秘書寫板

上文強調的假同源詞的出現顯然不足以論證文本背後存在的潛意識的心理過程和地震般強大的能量。有人可能會問,我們如何將這些出現的現象與其他無法解釋清楚的(修辭、習語或結構方面的)文本異常區分開來?我們如何將它們與單純的草率書寫或粗心編輯區分開來?當然,並非每個筆誤都會對文本閱讀產生重大影響(弗洛伊德說過,即使雪茄有時只是雪茄)?於是,為了證明用「絕境」「斷層線(fault-line)」或「節點(nodal point)」描述這些情況是有據可依的,我們似乎應該著重關注文本的另一個獨特方面。

在這一點上,弗洛伊德(1925)的「神秘書寫板」模式可能具有啟發意義。這一構想的萌芽在弗洛伊德創作之初就已顯現,在1896年12月6日寫給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寫到了記憶和心理機制的「分層(stratification)」(1954: 30),但直到三十年後的1925年,弗洛伊德才為他的記憶痕跡這一概念找到了

一個完美的模型。

「神秘書寫板」是一種兒童玩具，近百年後仍在市場上出售，且魅力不減。它的製作方法就是將一層薄的透明塑料薄膜覆蓋在一塊厚厚的蠟板上。用戶可以用任何尖銳的工具（甚至是指甲）在上面寫字。筆尖穿過塑料薄膜，在下面的蠟板上劃出一道微弱的凹痕，通過塑料薄膜看起來就像黑色的痕跡。如果將塑料薄膜從下面的蠟板表面揭開，黑色痕跡就會消失；書寫板又恢復乾淨，就像剛剛擦過的黑板一樣。因此，神秘書寫板可以接受無限次的標記，同時仍保持其接受能力。但與其他可擦寫表面不同，神秘書寫板在透明塑料薄膜下方的蠟質表面保留了先前標記過的痕跡，以凹痕的形式存在。對於弗洛伊德來說，這種玩具的「神秘」或魔法品質類似於感知系統的運作方式，感知系統接收來自外部世界的感覺印象，但它不會因為這些印象被標記，而是將它們傳遞到更深層次，在那裏它們作為潛意識記憶被記錄下來。因此，「書寫的出現和消失」類似於「在感知過程中意識的閃現和消逝」（1925：230）。

「神秘書寫板」的良性模式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用來否認精神和文本之間的邊界。德里達聲稱不存在無中介的感知。現實只能通過回顧加以理解，通過文本的痕跡，通過之前的書寫來進行介入。德里達說：「我們只有在書寫時才被書寫」，並且「書寫與壓抑密不可分」。與主權存在不同，德里達提出，「書寫的主體是各種層面之間的關係系統：神秘書寫板、心靈、社會、世界」（Derrida 1978：226）。這顯然與潛意識這一概念有關，因為它涉及各層之間的接觸：在真正作為玩具的神秘書寫板，接觸通過筆尖的壓力產生，使得透明塑料薄膜下面的蠟層上的凹痕顯示為黑色痕跡。我認為，這些接觸點就心理文本而言對應的是那些「不可讀的」令人疑惑的情況，它們抵抗並打開與文本互動的過程。

還是回到康拉德的作品，上面探討的三個假同源詞的例子不僅僅是可以歸因於法語意外幹擾下的翻譯錯誤，也是修辭意義上的轉喻的例子，違反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邊界，一個是人們在其中講述的世界，另一個是人們所講述的世界」（Genette 1972：236；王文融譯 1990：165）。轉喻指對敘事層次的超越：情節或人物的敘事層、敘述（敘述者）的外敘事層，以及有血有肉的作者生活和寫作的文本外歷史現實構成的元敘事層。這是一種挑戰表述邏輯的敘事策略，跨越了界限，模糊了人物、敘述者和作者的不同的本體論地位。

我們正討論的這三個文本就是這種情況。如果說《黑暗的心》的敘述者顯然就是馬洛——他在故事中提及的事件發生若干年後向聽眾講述了自己的使命，那麼 ignore 一詞的明顯誤用究竟是馬洛在行動時的想法，還是他在敘述時的想法，抑或是具有多語能力的康拉德這個真實存在的作者的想法——他曾為殖民帝國效力，並可能由此痛苦地覺得自己是共謀，或者痛苦地「故意選擇無視（自己的參與行為）」？這一點並不明確。《吉姆爺》中馬洛與法國中尉之間的對話中也出現了 quality 一詞的誤用，這個錯誤是否應該歸因於在行動時的馬洛，或敘述時的馬洛？或再一次歸因於康拉德本人？因為他本人面臨諸多問題：父親身份；有義務對他父親阿波羅·科爾澤尼奧夫斯基所代表的愛國傳統保持忠誠；被波蘭同胞指控背棄了祖國。最後，在《在西方的注視下》的敘事中，arrest 一詞的誤用是否應該歸因於拉祖莫夫的思想？這位主角將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心理活動。還是應該歸因於年長的匿名語言教師這位同時處於敘事層和超敘事層的敘述者？還是再次歸因於康拉德本人？就像拉祖莫夫最終成為了他幽靈般的他者的替身一樣，康拉德也是如此——儘管他很厭惡代表所有俄羅斯事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反映的斯拉夫傳統文化，但他實際上創作出了這部明顯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風格的小說。在文本內部、在其邊界線上及其在其外部，都是同樣矛盾的欲望和同樣的焦慮在產生共鳴。如果說三個層面的主人公都通過排斥斯拉夫「他者」（對拉祖莫夫而言是霍爾



丁；對敘述者而言是拉祖莫夫；對康拉德而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定義自己，這種排斥反而使主體容易受到被排斥的「他者」的入侵。在所有三個層面上對主體性的翻譯都是一種背叛的行為，這將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在這種情況下，物質證據是相當直接明了的：它以字母 K 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K 是被廢棄的斯拉夫自我（即康拉德的原始姓氏）Korzeniowski 的首字母，康拉德在整個手稿的文本空白處潦草地塗寫了這個字母。

至此，我們將這些自我誤譯的例子呈現為神秘書寫板在運作的典型表現，應該回到「文本潛意識工作」這個最初表述。我認為，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現在可以被重新定義為在文本中作者存在過多的情況，慾望或焦慮在本體論的邊界線上和跨越邊界線時的溢出，跨越文本各個層面的迴響系統，沒人能夠完全超越或完全掌控文本。無論是具有自我翻譯能力的作者主體的聲音、敘述者的聲音、對我們說話的角色的聲音，還是我們內心深處的陌生人為了讓她自己被聽到而發出的聲音，沒有一個聲音獨立於文本之外——這一點也是與德裏達的觀點相呼應的。

(Editors: Joe ZHANG & KCJ)